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一〇年第二期（总第5期）

深圳大学图书馆印度文献资料室

<http://www.lib.szu.edu.cn>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

E-mail:szucis@yahoo.com.cn

2010年12月30日

本期要目

凯伦·辛格专栏

天竺文宗

可爱的王子

泰戈尔国际研讨会专栏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

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

谭云山文献及研究专栏

解放后观光前诗

近诗九章

浴三海洋



2010年10月26日，章必功校长代表深圳大学为凯伦·辛格博士颁发名誉教授证书



2010年10月26日，凯伦·辛格博士参观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



2010年10月26日，凯伦·辛格博士参观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时签名留念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通讯

二〇一〇年第二期（总第5期）

主编：郁龙余

执行编辑：黄蓉 朱璇

目 录

凯伦·辛格简介.....	5
天竺文宗.....	6
可爱的王子.....	7
泰戈尔与中国.....	10
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	16
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	21
游走天竺 沉醉芬芳——蓝白交错中的 PONDICHERRY.....	27
解放后观光前诗.....	30
近诗九章.....	34

Newsletter of Indian Studies, Shenzhen University

2010.12.30

Contents

Prophet of Karan Singh.....	5
The Famous Indian Master: Karan Singh	6
The Lovely Prince.....	7
Tagore and China.....	10
Tagore is the golden bridg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16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Controversy When Tagore Visit China in 1924	21
Go Sightseeing on the Pondicherry.....	27
Before Sightseeing Poem after Liberation.....	30
Nine Poems.....	34

【凯伦·辛格专栏】

编者按：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这喜庆满溢的季节，我校迎来海内外咸知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 (ICCR) 主席——凯伦·辛格。凯伦·辛格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帮助我中心的各项活动，本期通讯在此为凯伦·辛格主席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

凯伦·辛格简介

黄蓉

他一直致力于社会事业，关注国家发展，传播印度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教育家，不如说是一位文化使者，一位文笔犀利、充满诗情的作家。他就是显赫于世、海内外咸知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 (ICCR) 主席——凯伦·辛格。

凯伦·辛格，1931年出生于法国戛纳，是查谟-克什米尔国的王子，现在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他少小思敏，成绩优异，18岁被其父亲任命为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摄政王”，开始其政治生涯。1957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硕士学位，此记录至今尚未被打破。博士毕业后两年被选举为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最高长官——“邦督”。1967年，他加入英·甘地领导下的联合内阁，36岁时成为印度内阁有史以来中最年轻的部长。不久他以绝对性的优势，被推选为人民议院的议会代表，并连任三届。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接连担任旅游与民航部部长，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部长，教育与文化部部长。开阔的视野和实干精神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90年，任印度驻美国大使。1991年至1996年，2004年10月至今，任奥罗维尔 (Auroville) 基金会的主席。2002年至2007年，任印度尼赫鲁大学校长。2005年至今，任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 (ICCR) 主席。政坛多年以来，凯伦·辛格卓越的领袖风范和迷人的外交风度倾倒不少中外友人。

凯伦·辛格不仅是一名领袖人物，还是一个传播印度哲学和印度文化的使者、演说家。他的演讲遍及五大洲，演讲内容包括哲学、文化、政治和环境。2002至2007年，辛格博士还活跃于许多其他文化及学术机构。他是印度巴纳拉斯大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日本创价大学等学校的荣誉博士。他还是享有声誉的罗马俱乐部的成员，在印度野生保护协会当主席已有多年。为了发展印度、强大国家，他还建立印度国际中心、印度论坛、环境与发展民族委员会，关注印度和世界当代自然、文化、宗教和思想，忧国忧民之心令人感动。

更让人敬佩的是，在任官职期间，辛格博士不但不领取政府薪酬，不居住政府所提供的住所，而且把收入捐赠给以他父母命名的 Hari-Tara 公益信托基金会，以此来帮助有需要的印度人民。除此之外，他还把查谟的 Amar Mahal 宫殿改建成博物馆和图书馆，与世人分享珍宝和现代印度艺术品，以及他私人收藏的逾两万册的图书。

也许是政治家的实践和普世价值观使得他获得了他人无可企及的创作素材，他的政治理想、浪漫的想象、对印度炽热的情怀铸造了他的赫赫功业，也淋漓精致地体现在作品中。他

著述颇丰，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仅关注政治科学、哲学、环境、文化，也有许多旅行见闻的文章和诗歌。著有《多样的旋律》、《光与影》（多格里民歌）、《印度国家主义的先知者》、《迎接月光》（诗）、《挑战与反应——独立后的一代》、《印度当代散文》、《印度的人口问题、贫穷及其未来》演讲录、《保卫宗教》、《一个人的世界》、《走向不朽》（《蒙查羯奥义书》）、《十字路口的博爱》、《自传》、《印度教散文集》、《在美国短暂逗留的日子》、《湿婆赞美诗及其他》、《湿婆之山》（小说）、《印度与世界》、《印度教：永恒的信仰》等作品。

天竺文宗

郁龙余

十月二十六日，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凯伦·辛格博士（Dr.Karan Singh）访问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授予他名誉教授证书，他为深大师生做了一场题为《中国印度两国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的演讲。

辛格主席的演讲，超乎想象的成功。420个座位的国际会议厅，不但全都坐满了，而且所有的过道也都坐满了人，门口沾满了人。据估计，听演讲者，超过了600人。演讲开始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可是五点多就有经济学院的学生来占位，说他们的课程刚好上到印度的经济与文化。

印度独立以前，辛格是克什米尔邦的王子，妻子是尼泊尔公主。印度独立后，他将昔日的王宫改为图书博物馆，将“私人终身津贴”捐给慈善组织。他先后出任过教育与文化部长等多个内阁部长，还当过尼赫鲁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兼任印度梵文中心主任，联邦作协主席，印度国际中心主席，印度寺庙协会主席，印度公共环境与发展协会主席。担任内阁部长期间，他从不拿政府薪俸，也不住政府官邸。

辛格主席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大作家。在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环境科学诸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的诗歌、小说、散文、演讲及自传，更是脍炙人口，为人津津乐道。

我想，演讲的成功主要来自内容本身。按照中国传统做法，演讲每到激动人心之处，就要喝彩；按照印度的传统做法，演讲每到精彩之处，与会长者就会用宏亮而庄严的声音唱一声 aum。我们深大的师生，则用现代通用的办法——使劲鼓掌。整个演讲，到底鼓了多少次掌，无人统计。总之，掌声不断，掌声如潮。考虑到辛格主席年近八旬，原计划演讲结束之后，不设问答环节。但是，在章校长请的午宴上，辛格主席说应该提问，他可以回答六七个问题。结果，一连十几个问题，都没有打住。我只得动用主持人的权力，结束了问答。

会场上的超级人气，还来自辛格主席的传奇人生和超凡的人品学问。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出圣人的国度。除了历史上著名的释迦牟尼之外，现代亦出了三位圣人：诗哲泰戈尔，圣雄甘地，圣哲阿罗频多。我认为，继以上三圣之后，当代印度的圣人，就是这位天竺文宗——凯伦·辛格。这样，他在印度，在中国，在世界众多地方，受到敬仰、爱戴，就有了合理解释。

辛格主席在深大演讲爆棚，再次告诉我们：崇圣与追星并行不悖，中国青年外国青人一然。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可爱的王子

——印度 ICCR 主席凯伦·辛格博士访问深大纪事

蔡枫

今年年初，印度驻穗总领事潘迪先生走访深大，透露印度对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凯伦·辛格博士将于今年十月下旬访问深圳大学，令我们兴奋不已。辛格博士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印度王子，他传奇的一生，引无数世人竞折腰。2006年，深大举行印度文化节，曾邀请他出席，但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没有下文。2008年，我们再次向这位王子发出邀请，恰逢他角逐印度总统，无法成行。今年，2010年，在中印建交60年的伟大时刻，他，姍然而至。

2010年10月26日上午10时，辛格博士在ICCR主任高尔先生、印度驻穗领事馆总领事潘迪先生、文化领事奈尔先生等的陪同下，抵达荔园。当他徐徐从轿车里走出来，一袭蓝灰色的甘地装，双手合十，微笑着向欢迎他的人们致敬时，我的心头涌起一阵虔诚，犹如在印度寺庙接受婆罗门祭司的祝福。他在郁龙余教授的引领下，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柯棣华诞辰100周年生平图片展”。

章必功校长、阮双琛副校长和高立天处长、黄东琳主任早已在会客厅等候。他们对辛格博士的到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章必功校长介绍了我校印度学研究的现状。他说，我校建有印度研究中心，在印度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南中国印度学的重要研究基地，印度知名人士、学者、演艺团频仍造访我校，极大地促进了我校的印度学研究，促进了中印两国文化和学术的交流。2008年，我校与印度ICCR签订了派遣印度学者来深访问的协议，第三位访问学者也于今天到访我校。辛格博士对深圳大学的印度学研究表示赞赏。2011年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辛格博士希望以此为契机，在深圳大学举办以泰戈尔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和庆典，以实际的文化行动，加深中印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信任。他获悉我校建有谭云山中印

友谊馆，决定赠予我校泰戈尔画作的高仿真复制品，陈列在谭云山馆。于此同时，为配合明年纪念泰戈尔的活动，他将派来著名歌唱家，为深大师生吟唱泰戈尔的诗歌。在一个小时的会谈中，辛格博士与章校长就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传统文化的互相传播，中国的儒家学说与佛教的关系，印度宗教在世界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这简直是一次学术的探讨，而不是程式化的会晤。中印两国古老文明在两位学者谈话中激荡、碰撞。辛格博士是一位著名作家，同时他对音乐、诗歌和印度历史颇有研究。此次访问，他向深圳大学赠送三部著作，包括辛格博士的自传、论印度教、与尼赫鲁的通信集。礼尚往来，章必功校长则向辛格博士赠送由中印翻译家合作出版的印地语版的《西游记》。

会谈结束后，辛格博士一行在郁龙余教授和他的学生的陪同下，参观位于图书馆六楼的谭云山中印友谊馆。为迎接辛格博士的到访，印度研究中心在谭云山馆特别制作了辛格博士图片展，展示出这位克什米尔邦的昔日王子捐赠给印度政府的皇宫和他的著作以及 2006 年写给深圳大学的贺信。辛格博士在谭云山馆仔细地阅谭云山生平事迹、谭云山文献和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当他透过书柜玻璃，看到 1957 年尼赫鲁写给谭云山教授的亲笔信的时，相当激动，以无比崇敬的声调，一字一句地朗读：“I am deeply grateful to you for your message of good wishes on the occasion of my birthday anniversary. I feel overwhelmed by the affection and goodwill I receive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find suitable words to give expression to my feelings. Jawaharlal Nehru. New Delhi, November 25, 1957.”当他看到黄养辉所绘的谭云山素描侧面肖像时，好奇地问我们，这是谁？我们回答是谭云山先生时，他若有所思地说，哦，谭中的父亲。当他看到墙上所挂的台北故宫博物馆胡进杉先生的六幅书法，由于悬挂不当，看上去有一点斜，就走过去，轻轻地将镜框扶正；当他与谭云山馆里阿旃陀壁画《持花菩萨》的临摹者陈嘉泽合影，他特意站在画的一边，让持花菩萨出现在照片的中间；当他看到玻璃柜里谭中先生所著的《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一书以螺旋形展示时，他如孩子般一样新奇，双手在空中模仿着划出螺旋曲线……尽管他在谭云山馆只逗留了不到 20 分钟，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点点滴滴，回味无穷。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王子，是一个真正的人，尽管他头衔众多，身份显赫，知识渊博，人生传奇，但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那双深邃得不能再深邃的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充满崇敬的眼睛和富有人情味的动作。那一刻，我非常想读他的自传，阅读这位可敬可爱王子的人生喜乐。

晚上七点，在国际会议厅将要上演辛格博士访问深圳大学的重头戏。章必功校长授予辛格博士名誉教授的荣衔，辛格博士为师生们带来题为《中印两国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的演讲。傍晚五点多，就有学生到国际会议厅占位等待了。到了六点半，会议厅座无虚席，到了七点钟，会议厅的二楼和过道，都坐满学生，连两个紧急出口都站满了学生，这是我在深圳大学参加学术讲座十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的情形，气氛非常热烈。七点钟，在舒缓的音乐声中，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辛格博士在章校长和印度官员的陪同下走上主席台。出席演讲会的中方嘉宾包括阮双琛副校长、著名翻译家何道宽教授、印度学家董本健教授等。

演讲会由郁龙余教授主持。章校长为演讲会做了简短致辞。他说，今年是中印建交六十周年，在这美好的日子，我们请来了辛格博士到我校访问讲学，这是深圳大学的一件大事。

深圳大学有志于在南中国建立一个从事印度文化研究的学术中心。这个中心近年发展良好，每年都有印度知名人士或印度学知名教授前来我校讲学。印度知名人士、驻华大使、领事馆领事、访问教授频繁出入深大。我校的印度学研究在国内国际学界名声鹊起，不少著名学者向我校捐赠文物。著名学者谭中教授将他的父亲谭云山教授生平所藏重要文献捐献给深圳大学，我们为此建立了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尼赫鲁大学校长契特教授从印度国家博物馆带来六件高仿真的佛教文物，赠与深圳大学，也陈列在谭云山馆里。今天，辛格博士莅临我校演讲，是光荣。辛格博士是印度 ICCR 主席，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是印度社会德高望重的掌门式的人物，他与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有过交往。今天他不远万里前来我校讲学，是对我校印度学研究的最大支持。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他，请他演讲。

辛格博士是非常认真而虔诚的人，他向鼓掌者合十致谢之后开始演讲。他说，深圳大学作为南中国的学术中心，是新中国的象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精髓所在。他用最简单最明了的语言，勾勒了从玄奘、鸠摩罗什至泰戈尔、谭云山，两千多年来中国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指出中印文明的交流从未中断，直至今天，仍在继续。今年是中印建交 60 周年，印度在中国的 30 多个城市举办“印度节”，而中国也相应地在印度各大城市举办“中国节”，中印两国友好精神一直在延续着。在演讲中，辛格博士认为，应该从八个方面加强中印两国文化联系：一、加强中印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学是国家发展的智库，高校之间的文化学术互动，有助于增强中印两国的互相理解和信任。大学之间互派访问教授，印度的高校乐于引进中文。二，中印学者应致力于互译两国的经典著作，举办国际研讨会，加强智库之间的联系。三，开展旅游合作，开辟旅游航线。佛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连接点。印度有菩提伽耶、那烂陀等著名佛教遗址，而中国的敦煌、龙门也是佛教文化的所在地。中印两国应以佛教文化为切入点，展开旅游方面的合作。四，印度拥有兴旺电影市场，印度经典电影如《流浪者之歌》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印度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有助于印度文化的传播。五，中印两国应该加紧搭建国际文化平台，促进双边文化遗产的交流。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两国经济和贸易合作。七，中印两国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的文化，而不是借用西方的眼睛认识彼此。八，中印两国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应该携手共进。最后，辛格博士用一句梵文诗结束当晚的演讲：让我们一同工作、一同成就，相互保护，并存而不存在憎恨，让和平的气息在各个领域传播。

演讲结束后，辛格博士非常耐心而认真地回答在场同学的提问。按照计划，演讲结束后不设提问环节，后因辛格博士的要求而临时增设，说好提二三个问题。但因举手提问的学生太多，气氛太热烈，最后他回答了 6 位学生提出的 9 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印度教育、中印双边关系、中印经济关系、印度宗教、印度文化，等等。如果不是由于时间关系，如果不是考虑到辛格博士年岁已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问答会持续一个晚上。演讲会在辛格博士虔诚的双手合十致谢中落幕，那一刻，整个会场洋溢着祥和温暖的气息，这种气息沁人心脾，足以驱赶夜的寒意。

【泰戈尔国际研讨会专栏】

特邀编者按：2010年12月15至17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访印，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共同宣布：2011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年。而2011年，恰逢诗人泰戈尔诞辰150周年。在印度，自上至下，都十分重视泰戈尔的纪念活动，成立了由政府总理出任主席的全国委员会。在中国，隆重纪念泰戈尔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泰戈尔在中国形象可亲，与读者心贴心。同时，通过纪念泰戈尔，弄清若干重大历史疑问，不仅对泰戈尔在中国的研究，而且对中国五四新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的研究，都大有助益。为此，我们在此刊出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莫尔多·沈、著名华人印度学家、印度国家学术奖莲花奖获得者谭中以及本人的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在国际语境下，围绕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从提出问题到阐释、解答问题，互为发明，逐步深入，体现了这一课题研究的最新进展。（特邀编辑为郁龙余教授）

泰戈尔与中国¹

[印]阿莫尔多·沈

阿莫尔多·沈（又译阿马蒂亚·森）是哈佛大学的托马斯·拉蒙特校级经济学和哲学教授以及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终身理事（从1998年至2004年担任该学院院长）。他于1998年因为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饥荒、人类发展理论、福利经济、贫穷的根本机制、性别不平等和政治自由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他获得8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他曾经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印度经济学会、世界经济学会以及经济学社的主席，还获得过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印度珍宝奖”。2010年《时代》杂志评选他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导言

生日是喜庆的时刻。150周年诞辰尤其应该笑颜舒展、热烈欢腾，不适合进行令人不悦的批判核查，或重开有争议的话题。泰戈尔150周年诞辰的庆祝活动大多是这样进行的，理应也该如此。然而，这样的场合也是提出疑问的适当时机，因为庆典不仅仅是怡情的时刻，也为智慧的交流和高雅品鉴提供了契机。在我们这本书中也出现相关重要的评论性文章，它们都将更具历史意义。因为就像讨论泰戈尔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包括他对中国的敬仰和中国对他的赞赏（我后面会谈到的）那么重要一样，现在探讨为什么1924年被翘首以待的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正逢其时。众所周知，这次访问引起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责难。尽管泰戈尔返回印度不久，他的在华演讲稿就被集成一书以英文形式在印度出版，但这本书并未像泰戈尔其他书籍那样被翻译成中文。而泰戈尔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停止这

¹ 黄蓉译，谭中审校。

一版本的发行，于是第二年在作了大量的修订后重新出版。尽管如此，该书仍未翻译成中文，显然，当时泰戈尔在中国的地位仍处于某种阴影之中。原因是什么？

这种别扭的关系也许非常让人难以理解，一来泰戈尔对中国充满着敬仰和热爱，同样中国早期也曾经对泰戈尔倍加赞赏，可后来是什么引起中国对泰戈尔的热情和广泛赞誉发生改变呢？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泰戈尔 1924 年伟大中国之行是发生在怎样的历史时刻。当时，欧洲惨不忍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泰戈尔被视为东方“圣人”的欧洲之旅也刚结束，在那儿他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欢迎。这些发生在 1913 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事件是怎样影响泰戈尔，反过来又怎样影响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态度的？当时泰戈尔曾深信——也说服了很多人——西方世界的发展之道存在着深层次的巨大缺陷，而印度、中国或者其他东方国家中的思想可以提供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来弥补这一缺陷。

另一方面，泰戈尔在获得诺贝尔奖不久就接到中国的邀请，可当他 1924 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知识界的氛围由于掺杂了政治因素而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当时的政治环境更多地聚焦于朝着激进方向发展的现实形势，而不是过去的历史文化。尽管仍然眷恋中国过去辉煌的历史，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掺入了当时激进的政治需求。爆发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一股由青年发起的重要激进的政治力量。就连最初对五四运动态度暧昧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后也卷入这一运动。泰戈尔到达中国之时，中国正处于一场大辩论中，其中有一部分人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部分新生积极分子却深切关注改造当今世界，不再留恋传统历史。泰戈尔的伟大中国之旅产生的效应是：一个激动的泰戈尔此时来到一个激动的国家，两种激动的情绪相互碰撞，然而并未能和谐共鸣。

泰戈尔对中国的尊崇与亲近

话分两头，在探讨上述的矛盾关系之前，我要简要地阐述一下泰戈尔是多么地尊崇和热爱中国，这一点尤为重要。泰戈尔虽然不懂中文，但他一生都对中国的深感兴趣，对丰富多彩的中国文明充满着敬仰之心。对于泰戈尔家族来说，中国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国度。泰戈尔的父亲代本德罗纳特·泰戈尔和祖父达罗卡纳特·泰戈尔都曾访问过中国，他父亲还对中国哲学大感兴趣。泰戈尔从孩提时就开始受到中国文化的陶冶。

我三生有幸，从小就读于泰戈尔在孟加拉邦的圣地尼克坦创建的一所非同寻常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某些学科可以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我亲历了泰戈尔是如何认真地确保在我们的教育中融会中国文化和成就的。事实上，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所创建的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是印度第一所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中国学院由一位伟大的学者、教育家、杰出的学术领袖谭云山教授来担任院长。谭云山教授 1927 年在新加坡结识了泰戈尔，1928 年，他来到圣地尼克坦的国际大学拜谒泰翁，被泰戈尔挽留留在圣地尼克坦主持中国研究。可以说，中国学院不仅仅为泰戈尔的教育机构锦上添花，而且还迅速成为全印度备受赞赏的中国学研究中心。

泰戈尔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不仅包括他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尊崇热爱，还包括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1881年，20岁的泰戈尔写下一篇强烈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文章。这场鸦片贸易使得包括泰戈尔在内的众多印度人极为困扰，因为大部分的鸦片都是在英属印度生产的。泰戈尔曾著孟加拉文“Chine Maraner Byabsa”（可以译为《毒害中国人的贸易》）全面抨击英国那摧毁中国人民的可怕政策。同样，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过去一直对日本敬仰交加的泰戈尔，在1938年9月12日愤慨地给他的朋友、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写信写道，他感到“悲痛和羞耻”，“中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痛苦的消息”使他备受煎熬。他还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骄傲地举出一个伟大日本的范例了”。

尽管泰戈尔1924年访华引发了争论，但他仍不断地努力与他所尊敬和热爱的中国建立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印度圣地尼克坦，由谭云山教授所主持的具有前瞻性的中国研究正是在那次充满争议的访问之后开创出来的。正如谭中（谭云山教授的儿子）在这本书中一篇富有启示性的文章《从地缘文明透镜看“RUBI兄”与“SUSIMA”之间的心传》中谈到，泰戈尔在访华后仍然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徐志摩，继续展开对话、保持思想交流。与此同时，谭云山教授所倡议的中印学会于1933年在南京成立，泰戈尔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该学会的印方主席。可见，毫无迹象表明，泰戈尔对中国的尊敬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有过丝毫地改变。

中国早期对泰戈尔的欣赏

如果说泰戈尔对中国的尊崇和热爱与他在1924年访华时所受到的批评形成一种对比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赞誉也同样与后来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宣布泰戈尔得奖之后，中国旋即出现许多表示泰戈尔实至名归的称赞言论。比如说，著名学者钱智修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描述泰戈尔不仅是一个穷毕生精力于祖国事业的人，还是一个关心人类福祉的人。中国其他重要学者也纷纷表示对泰戈尔的崇敬——除了徐志摩（前文已提到）之外，还有郭沫若、胡适等。在郭沫若的诗歌中，不仅可以看到泰戈尔的影响，还可以清晰地感到泰戈尔的思想丰富了郭沫若的诗篇内容。

1923年12月，在泰戈尔来华前夕，徐志摩给泰戈尔写信（如谭中所引）：“这里几乎所有的具有影响力的杂志都登载有关您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绍的。您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译成中文，有的还不止一种译本。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家，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在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的人心中，引起那么广泛真挚的兴趣。也没有几个作家（连我们的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像您这样把生气勃勃和浩瀚无边的鼓舞力量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泰戈尔无法预测在中国会有任何不友好的批评，而且这封信传递了另一层重要含义。泰戈尔认为他到中国演讲是一个传播他的理想去激励中国人民的大好时机。当时他正为西方的战争和暴力所困扰，并全身心地为不完善的西方文明本体寻找药方——可以预见——他来华的言论必然将含有“东西方相抗衡”的主题。

这个话题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之一。在深入探讨之前，我先要谈谈两个人们已经讨论过的，而且应该弄清楚的问题。它能解释为何出现形成鲜明对照的两种不同态度：一是中国人热爱泰戈尔的背景，二是泰戈尔来华访问后所引起的论争。

关于矛盾的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坚决认为当时中国反对泰戈尔访问的声音来自中国左派，特别是共产主义者。这种说法认为，中国早期对泰戈尔的赞美不是来自左派，而是来自其他阵营。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共产主义者发出批评的声音与其他阵营的赞美之声相对，也是正常的。中国对泰戈尔来华访问议论纷纷，如果仅仅简单地说成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思想家的分歧是很肤浅的。这对理解中国早期对泰戈尔的赞赏（来自反左派或者至少非左派）和后期对泰戈尔的批评（被坚定地认为来自左派）之间的反差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逻辑。

这种说法的缺点，从陈独秀的例子就能看出来。陈独秀是泰戈尔作品的翻译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事实上，他翻译了四首《吉檀迦利》的诗歌，并发表在他编辑的杂志《新青年》上。陈独秀还在注解中介绍说泰戈尔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也是印度青年的先觉。此外，还有很多属于左派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泰戈尔作品，并对他赞美有加，还评论他的杰出作品。如果要在政治派别中寻找解释，那就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左派的“反对”态度和来自另一方的持续“支持”态度之间的对立。

另一个说法过于简单肤浅。该说法认为邀请泰戈尔来华的组织是由一个传统保守的人所领导的，因此引起中国激进思想者的反感。这种说法必须要认真审查，它看似有理，因为邀请泰戈尔来华的是梁启超主持的北京讲学会，梁启超是一个传统思想深厚的人，他的想法时常会遭到许多激进派的尖锐批判。但是讲学会早期也邀请过许多令人敬畏的著名学者，例如伯特兰·罗素——他并不是什么典型的传统主义者——他的演讲也获得极大的成功。除此以外，还邀请过美国著名的大哲学家、激进思想权威约翰·杜威。

我们必须更加深入探讨泰戈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访华的目的。当时泰戈尔的思想还沉浸在野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久久不能恢复平静。除此以外，他还多少受到欧洲评论家，比如说叶芝的影响，他坚信通过著作，可以传播许多东方思想来给不完善的西方思维模式带去启示。因此，我们的分析应该集中在当时泰戈尔所关注的焦点，而不是仅仅归之于邀请他访华的学会的性质和政治见解。

泰戈尔对西方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杀戮，使得欧洲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转向寻找来自其他地方的真知灼见，当时泰戈尔的声音似乎非同凡响地合乎时宜。比如说深受泰戈尔影响的诗人魏尔孚莱德·欧文，在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可他最后却战死于沙场。有一首著名的诗，他谴责贺拉斯歌颂的为国捐躯的古老格言：“朋友，请不要激情万丈/向那些燃烧着荣耀欲火

的孩子们诉说/那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愉快而又光荣’”。魏尔孚莱德·欧文的母亲苏珊1920年给泰戈尔写信告知，他儿子奔赴战场并战死沙场的情形。透过战争的荒凉残忍，年轻的欧文仍能看到大自然和文明的美丽。他在战场上“透过阳光闪烁的海面，看着法兰西”。苏珊·欧文告诉泰戈尔，欧文离开时说“您那动人的诗句——开头第一句是‘我现在从这儿离去，希望这儿成为我的诀别’”当她战死的儿子那本掉在战场上的笔记本被送回给苏珊·欧文的时候，她发现（她写信告诉泰戈尔）“那些动人的诗句下面有您的名字”。

泰戈尔对这次世界大战极为震惊，其实是有原因的。然而，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残暴和战争是西方特有的痼疾，因为在东方历史上——印度、中国或者其他“东方国家”这种恶行不胜枚举。但当时欧洲的杀戮是不同寻常的，那些大屠杀的大刽子手都根植于西方，尤其是欧洲。

泰戈尔的政见及其多面性

泰戈尔对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暴行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及其他地方的暴行越来越失望、烦恼。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继续抨击在帝国主义环境下西方文明的失败。在他访问中国若干年后，在一本名为《时光流逝》的孟加拉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译者穆罕默德·哈比布尔·拉赫曼）：“欧洲文明不是为了启蒙，而是纵火。随之而来的是把枪炮和鸦片送往并燃烧中国的核心。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

然而，泰戈尔对西方的不满不只是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在言语的交往中他深深地受到西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批判者，尤其是叶芝和庞德等人的赞誉所影响。我曾在《纽约书评》（1997年6月26日）发表的和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2005）第五章“泰戈尔与他的印度”这两篇文章中详细探讨过。这种影响被泰戈尔内化，并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的时候要求西方多重视来自东方的思想。可当泰戈尔在华讲话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他就必然在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显得特别传统守旧。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泰戈尔批评西方思想体系，要求凸显东方思想的优越，这就必然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他不近常情——甚至反动。

泰戈尔到达上海后两天，他的左派崇拜者茅盾在《民国日报·觉悟》中撰文写道：

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绝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冥想去慰安泰戈尔。

这就是许多泰戈尔早期的崇拜者——大部分是左派，也有其他派别——所感觉到的对立心态，这种感觉并非无中生有。

我已经在别处讨论过，特别是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谈到了泰戈尔在西方受到的那种浮夸的赞扬误导了世界，对泰戈尔也产生了一种误导。我认为这一角度更能分析泰

戈尔伟大中国之行所产生的不幸——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场悲剧（当然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效）。与我们探讨特别有关的是：泰戈尔早期在欧洲受到的欢迎在泰戈尔心中产生了影响，他对世界大战的反思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点。有一点很重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这种影响对泰戈尔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微乎其微的，但对他在国外演讲内容的选择却起了特别的作用。

在印度，泰戈尔绝非传统保守主义者，他甚至还因为甘地太注重传统而与之争论。他一直相信科学和科学的思维模式。他全力推广平民教育，在他访问中国后不久，他称赞苏联推动全民教育以及为民众分忧的做法。1931年他出版的孟加拉文著作《俄罗斯书简》，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后，立即被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禁止，直到印度独立后才重印出版。

尽管泰戈尔的许多作品中关注的是非西方的传统，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向“纯粹的传统主义者”。他常常在国外评论一些他觉得人们乐于聆听的重要问题。然而英属印度停止了他对苏联的赞美，1930年访苏期间他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对苏联专制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消息报》没有发表他的谈话，只刊载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直到58年后的1988年，苏联《消息报》才把它刊载出来。

结语

现在必须结束这篇文章了。前面已经讨论过，1924年泰戈尔的伟大中国之行一方面引起了论争，另一方面泰戈尔对中国的尊崇和热爱，以及中国在他访华前对他的赞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需要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同时也需要对泰戈尔信念，对他在国内国外不同的演讲内容的选择，以及他早期在西方国家所受到的赞扬和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大悲剧对他的影响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如果矛盾在不赞成泰戈尔在华演讲的某些言论的情况下，还有可能继续崇敬泰戈尔的话，这种逻辑思维就能有助于理解上文所谈到的巨大反差。即便是我们在庆祝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我们也可以切实地认真思考一下泰戈尔的基本观点以及他在到世界各地讲演对内容的选择所造成的对立形势。

一方面，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有“裹挟”泰戈尔为西方批评者之嫌，并对他在国外演讲内容的选择（但非对他的基本观念和他在印度国内的演讲）起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1941年逝世前夕发表的最后一次主要演讲《文明的危机》中，泰戈尔执著地坚持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从西方汲取有益的知识，包括“探讨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以及最重要的……19世纪英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大胸襟”。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有益的东西已被“英国政府的威力重压所扼杀”，另外，“英国对那个伟大的、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的悲惨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只着眼于泰戈尔的某些作品和演讲——那些在交流中产生出一系列的复杂影响的作品与讲演——而忽略了泰戈尔宏观整体愿景中的丰富内容。泰戈尔与中

国的关系不是口号式的简单概述就能说明的,它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分析。当然,凡是研究伟大的人物,都是一本难念的经!

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

[印度]谭中*

在中国庆祝泰戈尔诞辰 150 周年有三大意义:(一)充分肯定泰戈尔这位千载难逢的伟大人物的历史意义,(二)通过泰戈尔的言论与行动来深刻认识中印两大文明的世界地位及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三)认识到泰戈尔式的人物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良好榜样,号召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士积极效法,使不久的未来中国也有不止一个泰戈尔来造福社会与人类。

泰戈尔既是大文豪(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又是圣人、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还是画家、歌唱家、2232 首歌曲以及印度与孟加拉国两个不同国歌的作者(全球绝无仅有),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非凡的,所有各项成就的总和就变得千古难逢了。

今天我们在中国庆祝泰戈尔寿诞最重要的目的是循着他的教导走出地缘政治范式的怪圈,进入地缘文明范式的思维探讨。“超越”是泰戈尔的符号。他超越种姓,超越语言,超越宗教,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超越现代,超越物质,超越精神,超越国界,超越东西方文明鸿沟。泰戈尔思想的创造性在于辐散性与收合性的有机结合。他不拘泥于一种思维范式,而是使思想渗透到不同宗教、不同传统、不同文明领域之中,又在吸取了各种不同养料以后把思维聚焦到一点上。

这一点变成概括世界文化的结晶。

泰戈尔以自己的努力与成就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西方世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金——的东方人。西方殖民主义者花了几百年功夫把东方的声望打入大牢,泰戈尔一夜之间就把它解放出来了。他的著作与言论不但使东方与西方平起平坐,他还能在西方国家的上层社会指手画脚地用东方文明教训西方,这对与泰戈尔同龄的中国知识精英是无法想象的。泰戈尔这种“长东方志气、灭西方威风”的义侠行为无形中提高了中印两大文明的世界地位。

泰戈尔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摆在很高的地位。1916 年,泰戈尔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演时说:“古希腊的明灯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罗马的威力被埋葬在它广大帝国的废墟之下。但是建筑在社会与人的精神理想基础上的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¹我们知道,中印两大文明

*作者简介:谭中(1929—),男,著名印籍华人印度学家,曾任德里大学中日系主任、尼赫鲁大学亚非语文系和东亚语文系主任,著述甚多。2010 年获颁印度国家学术奖“莲花奖”和中国“中印友好贡献奖”。

¹ Uma Das Gupta: *The Oxford India Tagore: Selected Writings on Education and Nationalism*, 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246

在两层意义上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它们经过几千年经久不衰（它们的“明灯”没有“在初点燃的土地上熄灭”），这是世界所有其他古文明没有的现象；（二）两千年以来一直至今，生活在中印两大文明中的总人数保持在人类 40% 左右（过去经常超过这一比率，现在稍稍下降）。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有一大差异。中国两千多年来基本上是大一统的政治状况，就是说，它是一个“文明国家”。印度一直到 1950 年“印度共和国”建立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此前则是一个“印度文明”伞下许许多多国家的总和，只能算作“文明世界”。无论如何，以上这两大非常不平凡的现象是相互联系的。

泰戈尔对这两大非凡现象有过精辟的分析，指出文明的力量在过去几千年中把庞大的人群聚集在中国和印度。他指出：“广大辽阔的中国不是受到刀剑统治的约束，而是被宗教的规则变得有纪律性。”他解释说，这“宗教”指的是社会自觉产生的“父子、兄弟姐妹、夫妇、左邻右舍”等的人际伦理关系。¹我对这一分析深有启发。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凝聚力来自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地球大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由于发展灌溉农业而结成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泰戈尔的分析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在这种共同利益上发展起来的自觉纪律性与和谐人际关系。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们聚拢在一起就产生爱心，就在“己”与“人”之间用爱心的纽带联结起来，“推己及人”，这就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印度文明同样提倡爱心，叫做“Brahmatmaikyam/梵我合一”（泰戈尔的著作可以说是“梵我合一”的结晶），是爱心使得印度文明像中国文明一样经久不衰。

泰戈尔根据当代的国际形势发展指出人生具有两大要素：“power/强力”和“love/爱心”。西方文明掌握了前者，东方文明掌握了后者。前者的代表是“科学”，是“机器”，是“民族主义”。泰戈尔把西方民族主义比作机器，没有生机、没有灵魂，本身不是目的。“机器的唯一作用在于一种达到目的的运用，在操作过程中认为道德良心愚蠢而不合时宜。”²中国和印度文明因为具有爱心得以持续几千年，两大文明的影响使得东方传统色彩与和谐气氛浓厚。西方却由于提倡强力而充满冲突、战争、毁灭，西方强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地缘政治范式提倡的“国富民强”的发展道路与地缘文明范式提倡的世界大同道路是分道扬镳的，一条引导人类走向毁灭，另一条把人类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泰戈尔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在这两条道路上有所选择。他 1937 年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开幕式上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是合作与爱心、互助互信创造文明的力量和真实优点。新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应该继续发展，使人类吸收科学的成就，管制他们的武器和机器，不然的话，武器和机器就会统治与奴役人类。我知道，很多人会指出中国和印度的衰弱，受到世界残酷侵略的强国的蹂躏，为了避免毁灭必须强调强力与发展。...我们必须懂得对付强国的傲慢而保卫我

¹ 引自摩炯达在《泰戈尔与中国》书中的文章，泰戈尔的话出自孟加拉文、英文《泰戈尔文集》，11 册，484 页。

² Uma Das Gupta: The Oxford India Tagore: Selected Writings on Education and Nationalism, 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172

们人类，却应该小心别仿效它们使我们自己也变得残酷，把我们人类值得保卫的价值葬送。”¹

应该看到，泰戈尔说以上这番话时，中印两国都衰弱，但他就有点担心我们效法西方追求强力而毁灭人类。现在中印两国都强盛了，就更应该聆听他的教导，与地缘政治范式分道扬镳，走上地缘文明范式发展世界大同的道路。

阿莫尔多·沈的最新文章²把泰戈尔 1924 年访华称为“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他认为访问结果是不幸的（甚至称之为“悲剧”），主要的原因既不能怪共产党人，也不能怪泰戈尔的东道主。他分析泰戈尔“的思想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情境中回荡”。他也认为泰戈尔在世时被西方知识界的赞扬所误导，使他觉得自己肩负了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的使命。这两大因素使泰戈尔于 1924 年带着这一使命访华，恰巧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扬弃东方文明而效法西方。“泰戈尔的伟大中国之旅产生的效应是：一个激动的泰戈尔此时来到一个激动的国家，两种激动的情绪相互碰撞，然而并未能和谐共鸣。”这是阿莫尔多·沈的观点。

我认为阿莫尔多·沈的这一解释不但富有新意，而且值得认真思考。我对此的直觉反应有三点。第一，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2010 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100 人之内的阿莫尔多·沈是个像当年泰戈尔那样的全球知名人士，说话是有分量的。他的祖父克蒂摩亨·沈

（Kshitimohan Sen）是随泰戈尔访华的代表团成员，阿莫尔多·沈从小就听到祖父讲述当年访华情景。因此，“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这个名称是具有权威性的，应该建立，应该在中国舆论界、特别是学术界统一口径，这样就可以减少来自各方的歪曲、误导与造谣中伤。

第二，阿莫尔多·沈以“一个激动的泰戈尔到达一个激动的中国”来形容 1924 年泰戈尔访华，简直是惟妙惟肖。然而，泰戈尔当时看到的是中国知识界呈现出鸭子浮水（表面上优哉游哉，暗地里斗争激烈）的假象，他不懂中文，所以没有透过假象深入了解中国内心的矛盾，因此也就不能使自己的讲演内容针对中国知识界内心的激动。泰戈尔自己在上海的告别讲话中对这一点有了一定程度的感觉。“我不够认真”，他说：“我没有机会深切地、竭尽全力诚恳地对你们最严重的问题表态”。³阿莫尔多·沈说那次“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不愉快的结束既不能怪陈独秀等极左人士，又不能怪梁启超、徐志摩等泰戈尔的东道主，这一论点完全正确，但也不是责怪泰戈尔本人。

第三，我的好友邬玛·达斯古普多教授对“泰戈尔与中国”的历史文献、档案进行了彻底调查研究，有新的发现。在她向我们大会的报告中，邬玛发现了泰戈尔访华临行前的激动。他在 1924 年 3 月写到中国“如此热情期待”他的访问。“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够格满足他们的期待，但我清楚地看到这一任务已经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必须把启示带往国外。我有时想，

¹ Sisir Kumar Das: *English Writing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 Volume Three: A Miscellany, 1996, p713-714

² [印]阿莫尔多·沈：《泰戈尔与中国》，深圳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³ Sisir Kumar Das: *Rabindranath Tagore: Talks in China*, Calcutta: Rabindra Bhavana, Visva-Bharati, 1999, p76

这究竟是谁的启示呢？我想不出它的名义来。正像春风中洋溢的欢乐突然变成树藤，那空中游移的启示突然到了我的声音之中。…我现在懂得我自己是许多信使的喉舌。”¹

现在我们平心静气来看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泰戈尔来华的反应（包括欢迎与批评的两极在内）都是很肤浅的，对泰戈尔的伟大思想缺乏深刻认识。简而言之，正像阿莫尔多·沈指出的，泰戈尔急切要以东方文明精神来改造世界秩序，当时的印度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日本东施效颦、不可救药，泰戈尔把希望着重寄托在中国，希望重振古代中印两大文明的兄弟情谊而建立全球国际关系的新风尚。当时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表示的冷淡、甚至不敬，是使他伤心的。但他并没有放弃，他于1927年热情欢迎谭云山去圣地尼克坦，1933年热情欢迎“中印学会”成立，1937年热情建立“中国学院”，又在1939年欢迎徐悲鸿时说，他期待着印中两国“一同步入温暖的亲谊时代，期待着（文明）历史力量在东方施展，把我们从四面袭来的黑暗中解救出来。”²虽然中国上层社会通过戴季陶、蒋介石，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到国际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和他在国际大学讲演中对泰戈尔的称赞已经把1924年的不愉快（我认为“悲剧”是莫须有的）抹掉了，但还没有正面、积极地响应泰戈尔联合中印两大文明改造世界秩序的伟大号召。如果最终中国并不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那“泰戈尔伟大的中国之行”的美言就变成空洞的装饰了。

最后，我们有三点理由证明泰戈尔式的人物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良好榜样。第一，泰戈尔从理论与行动上大力提倡“天人合一”，他既是发扬印度的优良传统，也是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把这种泰戈尔的生活方式发扬光大。第二，泰戈尔生活的多姿多彩，用扩张爱心来增进社会进步与和谐。这一点特别值得中国效法。第三，泰戈尔指出人类发展的两个方向与两条道路，这一点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中间是模糊的，应该以泰戈尔指引的方向来选择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

先谈泰戈尔的“天人合一”，他是自己从小体验到大自然与童真的天生关系，对社会人情把这一关系逐渐切断而发出抗议，因而发展出自己的“天人合一”生活方式。他有两大生活习惯：早起与敞开窗户。他总是在日出前起床，观察黎明的景象，从中悟出许多重大理论。在他1921年的讲演《真理的召唤》The Call for Truth中，泰戈尔富有诗意地说：

“在世界觉醒的早晨，如果我们民族的奋斗不和宇宙的理想相呼应，那就反映了我们精神的贫乏…当小鸟在黎明醒觉，它并不全神贯注寻找食物，它的翅膀不疲倦地在天空翱翔，它的喉咙歌唱着新的曙光的欢畅。全世界人类今天在向我们发出号召。”³

这种生动而精辟的理论，只有黎明前起床的人才能悟出。圣地尼克坦气候炎热，但泰戈尔连正午也把窗户敞开，让阳光照耀到屋子里来。雨季的时候，风雨雷电交加，泰戈尔也把窗户敞开，让风雨雷电和他的身体与思想交流，他的诗中充满了对雷雨的绘描，这也是只有像他

¹ 见邬玛·达斯古普多向本会提交的论文报告。

² Sisir Kumar Das:English Writings of Robindranath Tagore, New Delhi:Sahitya Akademi, Volume Three: A Mscellany, 1996, p850

³ Sisir Kumar Das:English Writings of Robindranath Tagore, New Delhi:Sahitya Akademi, Volume Three: A Mscellany, 1996, p424-425

那样有“天人合一”生活习惯的人才能创作出来的。由于泰戈尔切身体验“天人合一”，他对中国唐宋诗歌中的“天人合一”诗境也特别欣赏。

关于泰戈尔用扩张爱心来增进社会进步与和谐，我想引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邵葆丽寄给我的文章《泰戈尔与孟加拉社会现代性：妇女进入文化主流》（不久将会发表）来阐述。泰戈尔坚决主张男女平等。起初他著文批评社会风俗习惯，后来他改变方针，用他的社会影响开展社会文娱活动来增加妇女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创造了“Rabindra sangeet/泰戈尔音乐”（包括歌舞），其中女主角与男主角地位平等。由于“泰戈尔音乐”变成了孟加拉与印度上层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参加到“泰戈尔音乐”活动中的妇女自然而然变成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上层社会成员。现在，孟加拉群体中的女性都以擅长朗诵、唱歌、舞蹈、演戏为荣，甚至当作一种资历，就这样，不必通过批评斗争就能使妇女进入文化主流。这是十分值得中国学习的。泰戈尔不但多才多艺，文艺创作丰富，而且他的文艺创作大多成为广大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他作品中洋溢的爱心无形地灌输到社会风气与道德之中，这也是印度社会比较和谐的原因之一。中国最需要也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文化巨匠。

现在最后谈谈泰戈尔指出的人类发展的两个方向与两条道路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泰戈尔所说的人生两大要素：强力与爱心。强力是“我”字当头，唯我独尊，没有群众观点的；爱心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提倡世界大同的。在中国叫“世界大同”，在印度叫“*vasudhaiva kutumbakam*/天下一家”，这在把吃奶子的力都用在强力追求上的西方文明中是不强调的。泰戈尔的大量言论以及他在中国讲话的焦点就是要扬弃西方的道路而提倡中印文明的理想。我想引已故国学大师兼印度学大师季羨林的一番话：“从人类的全过程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¹凡是了解泰戈尔思想的人都知道，季羨林这番话正是发扬泰戈尔提倡的精神，在人类大发展方向上毫不含糊。

不幸许多评论家对季羨林提出的这一观点缺乏深刻了解。最近有一位哲学家写道：“我不大同意一个想法，认为中国学问可以解决世界一切问题。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觉得都是错误的。当今的世界是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过去“西方中心论”已经错误了，现在“东方中心论”，不是重复过去的错误吗？”²他继续说：“在弘扬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要继续学习西方，西方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学，而且西方文化也正在发生变化。后现代性的出现，在纠正现代性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建构性后现代某些思想，可能和前现代相通，比如我们前现代的‘天人合一’与他们提出的‘人与自然是一共同生命体’可以有相通之处。”³我认为季羨林的确反对“西方中心论”，但却从不提倡“东方中心论”。他是同意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点的。

¹ <http://baike.baidu.com/view/673141.htm>

² 汤一介：“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1日。

³ 汤一介：“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1日。

季羨林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为时太晚，他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引经据典作详细的诠释与深入的探讨了。如果我们深刻了解泰戈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就了解季羨林是企图发扬泰戈尔的理论。泰戈尔吸纳西方文明，提倡接受西方文明的优点，但批评西方发展的道路，先是国富民强，然后扩张侵略，最后导致人类毁灭，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惨痛教训。欧洲国家遭受世界大战的强烈破坏泰戈尔是目睹的，他也预言日本必然会在战争的道路上毁灭。泰戈尔当然没有完全看到美国变成超级大国的进程，但美国今天的窘境似乎也在泰戈尔的逻辑分析之中。美国文化在强力与爱心之间的选择与昔日的英、法、德、意、日帝国主义又有所区别，但它对强力的依依不舍正是它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最重要中的最重要，对印度当然也如此。当今中印两国逞强心迫切，中国比印度更甚。如果两国继续醉心于强力的追求而摒弃几千年文明传统中的爱心，它们也会蹈昔日西方帝国主义以及今天美国的覆辙。这就是我们庆祝泰戈尔 150 周年寿诞最最应该牢记的。希望中印两大文明通过这一庆祝结成友好伙伴去实现泰戈尔生前的用爱心改造国际秩序的宏伟愿景。

1924 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

——答国际知名学者阿莫尔多·沈之问

郁龙余

摘要：阿莫尔多·沈问：为什么 1924 年被翘首以待的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尽管原因多种多样，当时泰戈尔的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打倒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独立解放道路和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当然，我们不应回避，当时的左派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做法是失礼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然又会犯“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同样的错误。

关键词：泰戈尔访华；阿莫尔多·沈之问；根本原因

2010 年 8 月 22—25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上，出现了三个讨论热点。其中，第一个就是关于 1924 年泰戈尔访华引起争论的问题

¹。无论是会议论文还是与会者发言，许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极大兴趣。阿莫尔多·沈这位泰戈尔的小同乡²，有足够理由关注自己前辈乡贤的国外评价。他为会议提供的论文《泰戈尔与中国》，和他1997年写的《泰戈尔与他的印度》形成呼应³。阿莫尔多·沈认为，1924年泰戈尔访华，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反对和斥责。而现在也正是合适的时机来探究：“为什么1924年被翘首以待的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会带来如此多的问题”⁴。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场悲剧（当然也有许多积极的成效）。⁵著名学者谭中不同意他的悲剧说，认为“中国的上层社会通过戴季陶、蒋介石，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到国际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和他在国际大学讲演中对泰戈尔的称赞已经把1924年的不愉快(我认为‘悲剧’是莫须有的)抹掉了。”⁶

阿莫尔多·沈在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泰戈尔到达中国之时，中国就处于如此激烈的论争之中：一端是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另一端是新生积极分子深切关注改造当今世界，不要留恋传统历史。”⁷他的分析是深刻细致的，有很大的逻辑说服力。

印度著名的泰戈尔研究专家沙潘·摩炯达认为，是因为受到了西方人的影响。他说：“最早抗议与发生不和谐声音的不是中国的年轻左派，而是英国报刊。1924年4月24日的《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刊载了有关的社论与署名‘西方人’（Westerner）的读者来信。”

“那封读者来信说：‘有足够的理由质问哲学家和诗人泰戈尔，他访华的目的何在？是提倡精神理想吗？如果这样的话，他夸大民族的骄傲、激起民族偏见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难道亚洲没有犯下够他关注的罪恶？难道他找不到足够的事情去鼓励中国人有高尚的思想而不是对欧洲指手画脚呀？！’有意思的是，泰戈尔在中国呆得越久，这种情绪就越膨胀以至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中发酵。”⁸

中国学者则较多地认为，是当时国内外的信息局限造成对泰戈尔访华的种种误解甚至歪曲。例如，青年学者侯传文为会议提交了一篇名为《认同、误读与化用》的论文，讨论泰戈尔对《老子》的接受。在他的新著《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指出：“我国五四时期的文化人对泰戈尔也有许多误读。如在文学方面，突出了他善于幻想和超越现实的一面，忽略了他关心人生：关注实际的一面；在社会政治方面，夸大了他的出世隐退和保守妥协的一面，忽视了他作为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积极入世、斗争进取的一面；在哲学思想方面，强调了他追求梵我同一的无限境界的一面，消解了他执著生活、热爱人生

¹ 在会议论文集《泰戈尔与中国》、《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及与会学者发言中，形成了“1924年泰戈尔访华”、“泰戈尔和中国学院”、“泰戈尔与中国古典诗词”等三个讨论热点。其中，又以第一个问题讨论最为热烈。

² 阿莫尔多·沈（Amartya Sen），1933年出生在泰戈尔的国际大学所在地——圣地尼克坦。其名为泰戈尔所起，意为“永生”。他的祖父克蒂莫亨·沈（Kshitimohan Sen）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代表团成员。1998年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1913）相距85年，成了圣地尼克坦的佳话。

³ 此文原刊于1997年6月26日《纽约书评》。收于阿马蒂亚·森著，刘建译：《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9—93页。

⁴ [印]阿莫尔多·沈：《泰戈尔与中国》，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⁵ [印]阿莫尔多·沈：《泰戈尔与中国》，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⁶ 谭中：《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2010年8月22—25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9页。

⁷ [印]阿莫尔多·沈：《泰戈尔与中国》，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⁸ 王邦维、谭中主编：《泰戈尔与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的一面；在文化思想方面，强调了他因袭继承的传统性的一面，隐没了他突破创新的现代性的一面；在东西方问题上，抓住了他关于东方精神文明抵制西方物质文明的宣扬，丢掉了他对“活生生的西方文化”的赞美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¹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刘建则强调信息的稀缺，认为：鲁迅批评泰戈尔赞美“萨蒂”，“失于偏颇”。原因是“在他那个时代，除了一些诗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未译成中文，有关资料亦相当匮乏。因此，鲁迅很难对泰戈尔形成准确而全面的判断和评价。”²

谭中引用了一个尼赫鲁等人的观点，使我们对真正原因的了解又前进了一步。他说：“尼赫鲁和其他人曾经把中印两国的发展的主要分歧聚焦于一个英文字母‘r’之上——中国是‘revolution’（革命），印度是‘evolution’（进化）——，两者之者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³一个字母的差别，深刻揭示了中印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道路的不同，离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论的真正的原因只隔一道门了。

我们认为，以上学者都在尽力找寻1924年泰戈尔访华发生争议的真正原因，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们又认为，以上各家所述虽然都是重要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原因。

那么，1924年泰戈尔访华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陈独秀这个特殊人物。他是1924年责难泰戈尔访华最力者，又是最早将泰戈尔诗歌介绍来中国的翻译者⁴。他于1915年10月15日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四首《吉檀迦利》中的译诗。在“注”中他这样介绍：“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除了将“文学奖”误认为“和平奖”之外，陈独秀此时对泰戈尔的评价均属允当。但到1923年10月27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第20期上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尔？》一文。1924年，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集中发表了11篇文章，责难泰戈尔访华。⁵这些文章有三个特点：“（一）时间集中。几乎全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有时在一个刊物上同时发三篇文章，如1924年5月28日的《向导》第67期。5月30号泰戈尔就在上海乘船去了日本。显然，这些文章都是逐客令。（二）文章短小。陈独秀的文章都非常短小急促，有的只有一百多个字，如《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太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

¹ 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5页。

² 刘建：《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5日第6版。

³ 王邦维、谭中主编：《泰戈尔与中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⁴ 陈独秀用“五言”诗形式，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第1、2、25、36首诗。

⁵ 这些文章分别是：《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尔？》（《中国青年》第20期，1923年10月27日）、《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4月25日）、《太戈尔与梁启超》（《向导》第63期，1924年4月30日）、《好个友好无争的诗圣》（《向导》第63期，1924年4月30日）、《太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向导》第64期，1924年5月7日）、《太戈尔在北京》（《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第67期，1924年5月28日）、《诗人却不爱谈诗》（《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太戈尔与金钱主义》（《向导》第68期，1924年6月4日）、《反对太戈尔便是过激》（《向导》第69期，1924年6月11日）等文章。

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显然，这是一篇心胸狭小的骂人文章。（三）化名发表。也许陈独秀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失身份，所以都署名‘实庵’。以上三点出现在陈独秀身上，实际上反映了深刻的时代烙印、阶级烙印，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陈独秀的个人情绪。”¹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1915 年的陈独秀到 1924 年竟判若两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极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历史进程、社会形态、文化状况讲，中印两国在近代以前大体相似。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印两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情况。这主要表现为：

独立解放的道路不同。印度走的是非暴力的独立道路，从甘地到尼赫鲁一脉相承，其间虽有阿罗频多和 S.C.鲍斯等人主张暴力革命，但始终不能成为主流，或改变斗争方式，如阿罗频多，或在二战中陷于两难境地，如鲍斯。中国走的是武装革命的道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脉相承，其间虽有保皇改良的声音，但是十分孱弱。

打倒推翻的对象不同。印度自公元 1600 年后，渐渐沦为西方殖民地，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后，则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所以，印度的民族精英要推翻和打倒的，就是英国殖民当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但国家政权还掌握在代表西方列强利益的中国人手中。所以，中国的民族精英们要打倒和推翻的，首当其冲是中国的反动政府。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印度民族精英靠什么打败英国殖民者，靠留英学来的民主政治或现代科技？显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和现代科技，不但不能解放印度人民，而且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工具。他们赶走英国殖民者、拯救民族的唯一有效武器，是印度的传统文化。所以，印度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视传统文化为神圣，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对抗殖民者的武器——非暴力，也取自于民族的传统思想。在反殖独立斗争中，武器越是民族的，就越有杀伤力。除了“非暴力”(Ahimsa)之外，甘地还有意地选用了民族语言的“不合作”(Asahayog)、“坚持真理”(Satyagraha)、“自治”(Svaraj)，而决不用英语词汇。我们曾经说过：“印度学者在比较研究中知己知彼，敬祖重道，高声礼赞传统诗学”，“印度比较诗学高屋建瓴，俯视西方学术，不跟风、不失语，充满批判精神。”²其实，何止是诗学，在所有文化领域中，印度学者的这种自尊自爱立场是普遍常态。中国民族精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正好相反，采取的是否定与批判的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孔家店”的口号，因传统文化顽固，所以后来口号中又加了一个“倒”字，非要“打倒孔家店”不可。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似乎只能看到“吃人”二字。“全盘西化”的叫声，甚嚣尘上。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有的。不过人数不多，被扣上“保皇党”、“玄学鬼”的帽子后，就几乎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中国精英要如此仇视民族的传统文化呢？原因很简单，传统文化是中国旧政权的护身符。精英们要弃旧图新，要打倒腐朽、反动的旧政权，自然要将它的护身符一起打倒。

¹郁龙余：《中国人心中的泰戈尔》载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2010年8月22—25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1页。

²郁龙余：《中国印度诗学比较》，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年，第568页。

独立解放的道路、打倒推翻的对象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三者的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打倒推翻的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独立解放道路和对传统文化态度的不同。无可否认，中国自 1840 年尤其自 1919 年以后，批判传统文化的选择，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天的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然又会犯“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同样的错误。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盪、混乱、黑暗的年代。所有爱国者都在思考革命救国之道。就连出家僧人，也提出了“三大革命”（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不然不足以救佛教。于是出现“政治家、诗人、佛学家三位一体，造成变法、诗歌、佛学的三位一体”¹的独特社会景象。在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出现了民族精英“手持《薄伽梵歌》赴汤蹈火”的动人场面；而在中国，很难想象会出现“手拿《四书五经》冲锋陷阵”的景观。国情不同，斗争的对象、目标不同，其策略、手段亦不同。

了解了以上情况，我们对泰戈尔 1924 年访华引发争议，遭到中国左派精英的嘲讽、责难，就不会吃惊了。当时，泰戈尔的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这就是 1924 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并导致一系列不愉快事件的根本原因。抓住了这个根本原因，其他的问题就都不难回答了。当然，我们不应回避，当时的左派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做法，是失礼的。阿莫尔多·沈一再强调，泰戈尔在印度国内和国外的文化身份是不同的。在国内，泰戈尔倡导民主、科学，甚至认为甘地太过传统而与之争论；在国外的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一是因为他受到一战惨祸的刺激，的确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本质性缺陷，一方面受到西方崇拜者的赞扬的裹胁。应该说，当时泰戈尔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总体上要比中国的左派精英来得全面和深刻。

随着历史的前进，不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对 1924 年泰戈尔访华引起的争议，有了新的认识。1956 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国际大学对泰戈尔的高度评价，应该引起国际学者的足够重视。他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 1924 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²这位老资格的中国共产党人上述的这段讲话意味深长，为 30 年前的那场争议做了公正的结论。

1961 年，中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写出长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 100 周年》。他说：泰戈尔“有光风霁月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他能退隐田园，在大自然里冥想，写出那些爱自然、爱人类、爱星空、爱月夜的只给人一点美感的诗歌，但是他也能在群众大会上激昂慷慨地挥泪陈辞，朗诵自己的像火焰一般的爱国诗歌；当他看到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及其他魑魅魍魉横行霸道的时候，他也能横眉怒目、拍案而起，写出刀剑一般尖锐的诗句和文章。”³“周恩来以他政治家的睿智和感召力，在政治上为泰戈尔评价确定基调；季羨林

¹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49 页。

²《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6 期

³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 年，第 159 页。这篇长文写于 1961 年 2 月 21 日，但当时没有全文发表。其中的一些内容以《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为题，发表于《文艺报》1961 年第 5 期。其余内容以《泰

则以印度学首席专家的学术说服力，在学术上为泰戈尔评价划出了框架。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基调和季羨林的框架，经住了历史考验。因为它们是与与时俱进及实事求是的，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¹

在今天中国人的心目中，泰戈尔是一位道德高尚的爱国者，才华盖世的大诗人，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和中国文缘持久而深厚。这四大美好形象正好吻合中国人交友之道的四大原则：崇德、爱才、急难、惜缘。但是，由于沟通的问题，许多印度学者并不很清楚，中国人对泰戈尔有了非常一致的全新的评价。如果阿莫尔多·沈知道，也许就不会提出这个悲观的问题了。

另外，我们必须考虑泰戈尔本人对那次访华的感受。1925年，泰戈尔在《在中国的谈话》中说：“我从来不曾这样愉快，也从来不曾像与你们这样密切地与任何别的民族接触过。有些人，我觉得我们仿佛从小就已经相识。我在此逗留期间，一切都被安排得十分美好，我感到愉快。”²诗人在80岁时，依然对1924年的中国之旅，怀有美好的记忆。他在一首诗中

深情地写道：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在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
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³

戈与中国》、《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和1981年第2期。全文发表于《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之中。1978年12月17日，他在“羨林按”中说：“这是将近二十年前写的一篇纪念泰戈尔的文章。由于一些原因，当时没有发表。”季羨林在这个按语中，对泰戈尔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侵略，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艺的创作，他对中国的感情在印度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响应。”

¹ 郁龙余：《中国人心中的泰戈尔》载2010年8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编《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3页。

² 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Talks in China），印度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出版社，1925年，第112—113页。刘建译。

³ 《泰戈尔诗选》（谢冰心、石真、郑振铎、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81—182页。

我想，泰戈尔的这些美好感受，应在阿莫尔多·沈的“也有许多积极成果”之列吧。我们应尊重泰戈尔本人的感受，不必过多渲染其所谓“悲剧”色彩。何况在今日中国，泰戈尔在外国诗人中享有独尊地位。

今天，我们纪念泰戈尔诞生 150 周年，除了客观、公正、准确评价这位伟大诗人之外，还应学习他的高贵品格，毫不动摇地支持中国抗战、支持中印文化交流的坚定立场。谭中说，泰戈尔是中印之间的金桥。我们应倍加珍惜、爱护这座金桥。

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过泰戈尔这座金桥虚心主动地向印度学习，是极为重要的。

独立以后，印度人民在自己当家作主的情况下，不拘泥于争取独立时的道路、方法及对传统文化的立场，而是与时俱进，建立世俗政权，全面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同时对不合时宜的部分作出限制或禁止。如“萨蒂”制度、种姓制度、童婚习俗，等等。对西方文化，凡是有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都加以吸纳利用，反之则坚决排除。凡是与民族文化相冲突的，如酗酒、杀牛、色情等等，则严加管制。印度的这些政策和作为所体现的精神，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

当下中国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五四”时代。我们须应时而进，使我们的思想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和当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反映了百姓和知识精英回归传统精神家园的热切希望。我们应审时度势，顺应民意，认真回顾、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之路，汲取历史教训，以便制定一条跟上时代步伐、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符的新的文化之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旅途中，印度是一个极佳的参照。

加强中印文化交流，造福中印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对泰戈尔的最好纪念。

游走天竺 沉醉芬芳——蓝白交错中的 PONDICHERRY

蔡枫

若要问我，在走过的四个城市中，最喜欢哪个城市，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本地治里！喜欢她，不仅因为在这里吃到了久违的咖喱螃蟹，住上了带游泳池的欧式酒店，而是因为，在这个蓝白映画的异国外城，在某些空灵而肃穆的瞬间，蓦然回首，发现了那个不远处的自我。

8月25日下午，我们离开了奥罗村，奔赴本地治里。汽车缓缓驶过茂密的树林和葱绿的田野，穿越五彩的大街小巷。成堆的鲜花，成串的水果，彩色的房子，纱丽飘飘的印度女人，数种文字并列的路标，远近可见的寺庙和教堂……令人目不暇接，如梦如幻。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幢白色的小楼，恍如着白纱的仙女下凡，从门窗到墙面到阳台，一袭纯白。朋友们纷纷下车，我才回神，这就是我们将要下榻的 ATITHI 酒店。

刚进大堂，就有服务生热情地奉上橙汁冷饮，甜滋滋，凉沁沁，足以洗涤旅途的疲惫。ATITHI 酒店位于本地治里的市中心，有六层楼高，鹤立于周遭两三层楼高的民房中间，算是“高楼大厦”。站在六楼天台放眼远眺，颇有“一览众房小”的感觉。天空出奇的蓝，如一颗倒挂着的质地纯正的蓝宝石，许是刚刚是下过雨的缘故。远处是隐约可见的孟加拉湾，海天相接处，是一抹灰蓝。我站在 ATITHI 的天台上，在徐徐清风中，不知不觉神游到印度洋了。看来本地治里是一个适合神思的地方，要不然，印度近代圣哲奥罗宾多（Sir Aurobindo）和他虔诚的精神知己“圣母”米拉·阿尔法特（The Mother, Mira Alfassa）怎会选择这里？

今天的本地治里早已因奥罗宾多而闻名于世。作为印度哲学史上的里程碑人物，奥罗宾多与圣雄甘地、诗圣泰戈尔并称为印度现代三圣。1926 年，54 岁的奥罗宾多在知天命之年自觉地选择进入传统印度教所规定的“林栖期”，退隐于此，专注瑜伽修行。他在圣母的帮助下，在本地治里市中心建立奥罗宾多净修院（Sir Aurobindo Ashram），创办《雅利安》杂志，引领一场新的精神革命。这个净修院最初只有二十四学生，而今，以净修院为中心，已经发展成为近两千人的社区。地处人口数十万的现代之都的奥罗宾多净修院，虽然无法完全回到当初净修林般的幽寂和神圣，但仍是世界各地虔诚者向往的圣地。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导游，奥罗村村民，德裔印度美女 LISA 带我们去参观奥罗宾多净修院。第一站去的是位于 Rangapillai 街的净修院事务中心（Bureau Central）。我们在大门口脱了鞋，赤脚沿着植满花草的曲径通向展厅。这里长年展出奥罗宾多和圣母的生平事迹、精神实践图文和重要言论。在进去展厅之前，LISA 一再叮嘱我们要保持安静。于是，偌大的一个展厅，显得尤为空荡神秘。展厅呈对称布局，左边展出的是奥罗宾多的生平照片和言论，右边是圣母的生平照片。我还来不及完全浏览完展厅的所有图文，LISA 就催促我们去净修院。在匆忙离开的时候，我发现进门时看到的镶嵌金字“Bureau Central”的红瓦墙背面，竟然有一个小水池，水池中央并列放着奥罗宾多和圣母的相片（A3 大小）。令人惊诧的是，在相框的前面，供着白茉莉花、黄兰花和粉莲花，焚着的三炷印度香，宛若神龛。烟雾袅袅萦绕，似有若无，芬芳沉醉。看来，在印度人心目中，哲学家奥罗宾多和圣母等同于神，值得人们顶礼膜拜。以前，当我在书中读到，印度人将古代著名诗学家婆罗多奉为大神，古往今来大凡戏剧表演者、舞蹈者、文艺理论者皆奉婆罗多为大神，创作前要上香礼拜，不禁莞尔一笑，半信半疑。现在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印度历史不断被神化的进程中，伟大人物如婆罗多早已位居神列，与神话中的大梵天、湿婆和毗湿奴为伍。

从净修院事务中心出来，向东走 5 分钟，便是奥罗宾多净修院。净修院所在的街道，绿树成荫，寂静而清凉。两边是错落有致的灰白相间的欧式建筑，简约而凝重。大老远，就看到净修院左墙角钢柱上悬挂的禁止鸣笛的标志。无论是印度人还是法国人，无论是披着绚烂纱丽的年轻女子，还是一身素白的修行者，经过修道院的门口，都会停下匆匆步伐，对着修道院虔诚而缓慢地合掌礼拜。我们在净修院的对面寄存了鞋，轻轻走进奥罗宾多净修院。

这是一座庭院式的二层建筑，院子中间是长方形的大理石墓，朴素无华，奥罗宾多和圣母长眠于此。墓台上，灿烂鲜花满布。前来参拜的人们，或低头含胸绕墓一圈，或跪于墓前合十礼拜，或叩头于墓石，或拈花于额头于胸口，神情无不肃穆虔诚。石墓的上方，是虬枝

盘曲，枝叶稠密的菩提树，入土生根，形似支柱，树冠如伞，浓荫覆地。菩提树下菩提心。净修，对印度人来说，并不陌生。古往今来，梵我合一是印度人最高的人生理想。于是便有佛陀在菩提树下参悟得道，大雄在参天古木下修心炼志，婆罗门在远离城阙的森林里苦行著述。这白色的小院延续着数千年来的遗风。树影婆娑中，修行者与参拜者，席地而坐，闭目冥思，他们的思想定然随徐徐清风到达最遥远的彼岸。我感到一阵愉悦，在墓的右边盘膝而坐，模仿身边的修行者，双手置于膝上，双掌朝天，垂眉合目。在那一刻，花香盈盈，沁入心脾；在那一刻，意境澄澄，宁静致远。仿佛看到了当年奥罗宾多一身白裳在此修炼瑜伽的情景，仿佛听到了遥远的喜拉玛雅山麓净修林里梵行者渺渺的念经声。这一刻，逝者如斯，这一刻，日长地久。如果，不是朋友的唤醒我，我愿永远，随着这花香，这清风，这静谧，沉醉下去，“用心灵的眼睛瞭望古老的印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泰戈尔诗《净修林》）

从奥罗宾多净修院出来，我们决定去离城市最近的宁静海滩（Serenity Beach）。沿途尽是法式建筑，书店、酒吧、商店、教堂、衙门、宾馆、民居……，连街道的名字都是法式命名。行走其中，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法国海滨小城。历史常常喜欢开玩笑，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在这居住了数十个世纪之后为法国人所统治，近三个世纪的殖民文化改写了本地治里，使这座昔日以达罗毗荼文化为底蕴的小渔村成为著名的东西文化交汇地，看起来有点“不太印度”，却洋溢着法国的典雅和浪漫。而也正因如此，引无数游客前来揽胜。

正午阳光灿灿，宁静海滩显得无比宁静。放眼远眺，是一片无限宽广的翡翠般的大海，碧波涟涟。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远处，是湛蓝的海与碧蓝的天相连成一线。近处，白浪滔滔，拍击着墨绿色的砾石，永无休止地弹奏着舒缓的海之乐章。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大概是生于海滨，长于海滨的缘故，山水之间，我更喜欢水。面朝大海，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无比澄明，如同那翡翠一般，沁凉而沉凝，温润而灵动，思绪随着海浪翩翩起舞，九霄云外无处觅。

本地治里的宁静海滩，给人别样的感觉，刷新了我对大海的审美期待：碧海白浪、蓝天白云和金色沙滩。在蓝白映画的海景中，有几抹色彩，值得特别回味。海岸上，每隔数百米，便有一辆卖冰激凌的小推车。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冰激凌车，桃红的，亮黄的，翠绿的……色彩和造型绝不雷同。那娇滴可爱的颜色，令人忍不住对冰柜里的冰激凌充满无比美好想象。挡不住的诱惑，我花了二十卢比，买了一支黄橙橙的芒果冰棍。店主是个典型的南印度人，开朗热情，黝黑的长脸绽放着幸福的笑容。他以为我是日本人，用生硬的日语向我打招呼。我说我是中国人，他马上问我如何用中文说“你好”。当我要求拍照时，他爽快答应，摆出印度式的经典姿势，笑得无比灿烂憨厚。真好！这种感觉，胜于吃冰激凌，美滋美滋！迎着略带咸味的海风，沐浴着炎炎日光，在异乡的海边漫步，惬意得仿佛时光倒流回到童年。身边不时有印度女人，三三两两，擦肩而过，海风轻拂，纱丽飘飘，风情万种，为海天蓝白底片轻轻抹上一笔绚丽，真美！海滩的另外一头，白色莲花小亭里，是四米高的圣雄甘地像。他执着手杖，背靠大海，昂首迈步，领导印度人将非暴力运动进行到底。我远远地瞻仰着圣

雄，想起了深圳莲花山上的邓小平塑像。他面朝大海，阔步向前，领导中国人谱写春暖花开的故事。游思中，我们坐上了大巴，奔赴下一站。

（作者于 2010 年暑假赴南印度参加亚洲公民大会和中印韩青年论坛，本文为印度行所看所思系列记录之一）

【谭云山文献专栏】

解放后观光前诗

二篇

（照录新加坡南洋商报）

第一篇 偶感八章

（一）

往昔存心怕作郎，而今儿女却成行；
恩情似海深难测，道义如云莫等量。

（二）

手植桃李千万枝，芬芳馥郁各矜持；
春风有意播香种，时雨无心润色姿。

（三）

池中莲叶自芊芊，出水芙蓉分外妍；
玉立亭亭心不动，几经浊世未沾尘。

（四）

大千宇宙岂幽玄？聚合分离本夙愿；
难得此身作道侣，优游自在到人间。

(五)

孔圣立言在春秋，释迦传教薄王侯；
此心千古未磨灭，得志忘怀任去留。

(六)

时衰世乱慕前贤，宏愿坚持度众生；
日月经天凭仰止，江河行地耐缘牵。

(七)

少年自负且多情，三十以来未动心；
明月清风解我意，相存相问许知音。

(八)

衡岳崔巍灵秀钟，三湘七泽多英雄；
美人香草今何在，海角天涯古国中。

一九五零年四月八日於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第二篇 怀旧八首

(一)

祖国秋高，江山无限好；
安得插翅归故国？梦魂缭绕！

(二)

昨夜雨急，不胜相思意；
满院落花怎收拾？泪痕点滴！

(三)

记取当年，一见如故人；
多少话语凭谁诉？梦里温存！

(四)

玉洁冰清，何事却多心？
而今天涯沦落客，谁共衷情！

(五)

海誓山盟，同参圣佛仙；
心如虚空何罣碍？众生悲悯！

(六)

好自珍重，少恼更少病；

莫错随缘真实义，为觉有情！

(七)

一片真诚，苦口兼婆心；

从来忠言多逆耳，求仁得仁！

(八)

难忍能忍，怨亲皆平等；

是非荣辱浮云逝，日月中天！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於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附『浓烟』题句（有跋）

谁是毛振东？书中主人翁；

更名又换姓，立意在大同。

『浓烟』一书，为三十年前在南洋同事老友林参天兄所作。采用通俗文艺小说体裁，描写南洋华侨教育生活实相。并提示若干严重问题，以供热心从事南洋华侨教育工作者探讨。用意深远，文笔畅达。可作故事小说读，亦可作教育论文读。

此书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写完，于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茅盾、傅东华等领导之中国文学社出版作为『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生活书店总经售。出版后，曾在中国文坛轰动一时，公认为反映海外华侨教育生活之唯一巨著。但不久即因卢沟桥事变发生，消息隔绝。

迨至一九四一年五月三日，林参天兄始由南洋马来半岛首都吉隆坡寄我一册。循环展诵，未忍释手。书中故事，却以余为主角，化名『毛振东』。读完之后，不禁赧然失笑。其实所

叙若干内幕情节，余当时亦在『浓烟』笼罩之中，尚未知也。因随笔题书四句如上，略志感想，今事隔三十年，比时彼此皆年仅二十余岁。余尝自云：『不知老之将至』。谅老友林兄，亦依然『留得青山』如昨矣！

兹忽于新加坡南洋商报，得悉此书现又由南洋青年书局重排出版，列为『南方文丛』之一。并称：『林参天先生，是马华文坛久负盛名的老作家；本书是马华最早一部长篇小说。』幸快之忱，诚匪言可喻；同时又重新引起几许旧感。用特附录於此，聊表故旧情深，至今未能忘怀云耳！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於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附录乙

近诗九章

（照录印度中国新闻报）

一 访亲四切（四章）

（一）

往事见面殊惆怅，者次重逢喜气扬；
有地英雄堪用武，才华两并共登场。

（二）

生当浊世自艰难，今日情形又别看；
利器在怀聊一试，披荆剪棘斩楼兰。

（三）

莫问年华剩几许，时光片刻不磋跎
梁灏八二魁多士，宝墨中年正好磨。

(四)

教学持家兼擅长，双重任务好担当；

赠言屡屡亦多事，谨记旧诗十六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印度首都新德里政府宾馆

二 和允元韵（一章）

饱学经年才益多，

书香家世客中过；

春风化雨满天下，

绛帐弦歌舞婆娑！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於印度国际大学中中国学院

三 赋答内表（四章）

(一)

廿八年前桑梓行，君年尚幼我年青；

东山雅集思犹昨，喜到而今日日新。

(二)

从来四海认为家，难得亲人共岁华；

多谢珍馐甘露饮，客中作客兴尤赊。

(三)

白马投荒步昔贤，至心宏愿未经宣；

梵编三绝待谁续？且看今人胜古人。

(四)

灵山胜会久茫然，几次登临仔细观；

顿化娑婆成净土，东风压倒西风残。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於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附录丙

浴三海洋

(照录印度中国新闻报)

序

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偕女儿谭元参加国际大学美术学院年假教育旅行团，游览南印各文化教育中心地区，并瞻礼各宗教名胜古迹

先至马都拉斯·麻哈巴利普兰，得浴於孟加拉海湾。波涛澎湃，心悅神怡。遥望祖国，建设耀进，不胜兴奋。因成《东浴孟加拉湾》诗一首。

次至喀拉拉·屈凡掬兰，得浴阿拉伯海。风浪汹涌，胸怀激盪。转念阿拉伯诸邻国，风云正急，颇多感慨。再成《西浴阿拉伯海》诗一首。

再至印度极南端，科母灵地角，得浴印度洋滨。此处三海洋连接，气象更无限雄壮。因思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和平相处数千年，亲如兄弟。过去对于世界人类之贡献，罕有其匹。今当世界大转变时代，两国所负之共同使命，益加重大。又成『南浴科母灵印度洋』诗一首。

兹联合成篇，冠以总题：《浴三海洋寄怀祖国》，聊记鸿爪，并略识胸臆之一斑耳。

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於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一 东浴孟加拉湾

旅印三十年，风光行看遍；
今浴孟加拉湾，波浪喜奔腾。
渺漭无涯际，不知水浅深；
仰视天高飞，俯瞰地浮沉。
翘首望祖国，兴高无比伦；
解放未十载，富强已空前。
生产大跃进，干劲上冲天；
公社进大同，祖国先着鞭。
焉得生羽翼，翱翔天安门；
兆民随高呼，同庆十周年。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马都拉斯·麻哈巴利普兰

二 西浴阿拉伯海

既浴孟加拉湾，又沐阿拉海；
波涛同壮阔，风光亦伟哉。
但惜人事非，且喜日月改；
遥望海彼岸，亦庆亦悲哀。

密迩诸邻国，何事相忌猜？

枷锁既挣脱，歧路又徘徊。

世界两主义，资本与社会；

人类两途径，生存与毁灭。

亚非求生存，和平与团结；

何去与何从？愿共善抉择。

一九五九年一月五日於喀拉拉·屈凡掬兰

三 南浴科母灵地角

印度洋滨

伟哉科母灵，印度洋之滨；

自古称神圣，如今更著名。

东连孟加拉，西接阿拉海；

海洋相连接，气象更伟大。

我生亦何幸，旅印三十年；

今浴三海洋，喜乐益无边。

胸怀广宇宙，意志超凡尘；

忍辱为救世，慈悲度众生。

天下本一家，印中为弟兄；

共倡五原则，和平遍大千。

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於南极印科母灵地角



内部资料 仅限交流